

李 展 / 著

湖
北


湖北文学专题论稿

文
学

本书由武汉纺织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湖北文学专题论稿

李 展 / 著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北文学专题论稿/李展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8

ISBN 978-7-216-08701-8

I. 湖… II. 李…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湖北省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2189号

出品人:姚德海

责任部门:高等教育分社

责任编辑:沈红

封面设计:刘舒扬

责任校对:范承勇

责任印制:杜义平

法律顾问:王在刚

出版发行:湖北人民出版社

印刷: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版次:2015年8月第1版

字数:219千字

书号:ISBN 978-7-216-08701-8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268号

邮编:430070

印张:9.125

印次: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插页:2

定价:38.00元

本社网址: <http://www.hbpp.com.cn>

本社旗舰店: <http://hbrmcbs.tmall.com>

读者服务部电话: 027-87679656

投诉举报电话: 027-87679757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自序

湖北文学以楚文化为基础发展至今，有着鲜明的精神特质和文学气质。作为一种被区域文化所养育的这朵湖北文学奇葩，即使在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荆楚文化的那种鲜活的精神气息和性格特征，即使内容已大不相同了。

比如，在中国文学史上向来“风骚”并举。“风”当然指“国风”，代指《诗经》，表达的是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传统；而“骚”当然指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具有深刻浪漫精神的楚文化，带有自然瑰丽和巫鬼神秘色彩。今天，在湖北文学中以池莉为代表的新写实主义文学，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但在其中我们很难发现楚骚文化的瑰丽和神奇色彩。不过，只要你细读下去，池莉文学中那种坚韧，那种执着，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又多么像屈原的上天入地的追求，这里面贯穿着楚人的那种执着、坚韧、敏锐、自信和夸饰，具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文化特点；而这种文化性格又与现代文学中闻一多、胡风等人的性格多么相似，有一种宁折不弯的东西在里面。由此可见湖北文化基因里的那种硬气和坚韧。

从楚文化的源头开始，湖北文学历经道家文化、儒家文化和禅宗文化的多重文化洗礼，不断演变。不过，自从楚文化的繁盛过后，真正全面崛起的时代是明代。明代文化表面是朱氏皇族正统文化，但是到了明代张居正时代，全面掌权的是湖北文化精英集团。在张居

正时代,无论在政治、经济、哲学还是在文学上,展现的社会文化无不带有鲜明的楚人精神。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对于当时首府张居正和万历皇帝关系的描写,对于时局的关注及内在的精神气质的呈现,其实都反映了当时湖北精英集团的集体精神;而本书关注的公安派不仅是一个文学流派,而且属于当时湖北精英团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其文学创作当中儒家文化和禅宗文化精神都有鲜明的体现。

同时,在明代湖北还有一个地方成为后世道教文化的圣地,这就是武当山。这里出现了一代武学宗师张三丰。后世的武侠小说和影视围绕少林和武当,掀起了武侠文化的热潮。作为具有本土宗教文化色彩的武当道教文化,其重生、养身、济世的文化品格和杰出现实表现,在道教文化中独具一格;而著名的太极文化,到现在广告词还有“问道武当山,养生太极湖”的说法。而太极文化从一种哲学落实到生活中,太极拳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现在关于其真正的发源地还在一直争论,但是“武当太极”经过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以及对张三丰生平活动地点的确切考证,证明武当道教文化已成为湖北文化的又一著名名片。

明代,是楚文化之后的又一次辉煌。这里凝聚着楚文化的真正智慧和瑰丽。

到了近现代,湖北武汉成为辛亥革命的发源地,武汉的城市文化精神就是“敢为人先,追求卓越”。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的真正开端,这里孕育的民族独立和民主共和精神,成为后世革命文化的真正精髓。在后来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非常密切。直到这时,湖北文化乃至湖北文学的精神都为之一变。湖北红安出了两百多位将军,《洪湖赤卫队》的影响余音犹在,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中,那所谓“革命文学”传统其是是非非虽有待重新考订,但是,革命文化已经牢牢地打在了湖北文学身上则

是不争的事实。以池莉为代表的新写实主义文学尽管表面上写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市民现实生活的社会症候，但是，若要真正明白池莉的新写实主义，则必须放到这个革命文化传统之中考察，池莉甚至有意在《所以》里面将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孩子们的游戏中共混在一起；而方方更是写了《武昌城》，并获得了2012年度“第十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可见其寻找文化精神谱系的强烈冲动。

不过，在现代文化中，湖北文化的另外一支古典文脉需要我们重新重视。晚近以来，鄂东地区人才辈出，诞生了一批学问精湛、狷介不羁、特立独行之士，其中最著名者当推熊十力、黄侃、闻一多、徐复观等人，而徐复观又是受乡贤熊十力之海导，走上学问之途的。在新儒学的发展史上，熊十力和他的学生徐复观都具有重要的文化地位；徐复观还有一本体现古典文化精神的重要文艺诗学著作《中国艺术精神》。此外，由湖北黄梅的禅宗五祖弘忍和尚掀起的禅宗文化，虽然被六祖慧能的大名所压倒，但是，废名小说中的那种禅宗味道则还是上承了这种传统，可以与袁宗道的文脉相接。而道家文化在武侠小说中得到凸显，但其超越精神则被大众文化的世俗潮流所裹挟。这些都是湖北文化及文学创作值得关注的方面。因为，这些文化及文学精神的表现，基本都被后来的革命文化和世俗文化精神所淹没了。湖北文学精神的探索进入了一种相对黯淡的阶段。由此，湖北当代文学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谱系，借鉴其他地域甚至世界的文化资源，借鉴以胡风为代表的现代理性精神和古典文化传统，只有这样才能继承和发展。

湖北地处中国中部，从好处说，以武汉为代表的地域优势是“九省通衢”，四通八达，但从坏处说，则一旦交流匮乏就容易封闭保守。从新写实主义的情况看，这种文化症候已经表露出来。因此，在本书中关于湖北作家王晓英的小说和诗歌的论述，就是着眼于当代湖北文化的交融和最新发展来看待的。王晓英现在是湖北网络文学协会

主席,但其真实的文化背景则是江浙文化,她在湖北文坛的出现,犹如林白一样,带有外来文化与湖北文化交融的意味;同时,作为网络文学的代表则又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特点,其作为文学创作的鲜明的诗意特征是池莉等湖北本土作家所匮乏的。同时,传统文化也是湖北文学亟须补充的养分,这里将《红楼梦》、陶渊明诗歌等部分古典研究,作为补充,虽然属于湖北文学之外,但是从王晓英的文学创作和成为湖北作家的新一代代表人物的身上,我们已经看到其在诗歌创作和小说创作中对于文学资源的整合了,而这种文学之为文学的诗艺正是湖北本土文学缺乏的。因此,大约也不算话外吧。

本书尽管着眼于湖北文化精神谱系在文学中的表现来加以论述,但是具体到写作,还是以文学专题的形式呈现出来,从而形成了“袁宗道与公安派的兴起”、“道文化、武侠与太极武当”、“池莉与新写实主义研究”、“湖北网络文学”、“湖北诗歌创作评论”、“他山之石:源远流长的古典诗学传统”六大部分,分别着眼于公安派文学与禅宗及心学、武侠文化与道教及当代大众文化、新市民文学和革命文化、网络文学、新世纪诗歌诗学、古典诗学传统与文学创作之间的相互关联,来考察这种文学精神。因此,这不可能是一部完整的湖北文学精神史稿,而只是从具体研究专题出发的专题评论。因为是专题性的文学或文化论述,涉及更多的是当下生活中对湖北人的直接感受——这个问题是源于笔者来到陌生湖北的一些实际人生困惑而展开的,这便成了笔者写作的直接原因。这部书稿便成为探索湖北精神谱系与实际观感的文学(文化)的专题评论。从系统文学精神谱系的角度看,书中所选文学专题的理由或许牵强,比如对湖北当代文学就没有涉及刘醒龙等英山作家群和方方等一批作家,而这些作家涉及近年比较重要的底层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问题。但从文学专题论稿以点带面的角度看,从自己接受的湖北文学熏染这种角度看,更多是对以前文学阅读经验的总结,但即使这种总结,却也看到了

当代湖北文学发展的某些局限或者病症。杜威在《内容与形式》中，曾经谈到“善于观看艺术作品的一个重要才能——许多批评家所没有的才能——是掌握某画家对物体特别感兴趣的那些方面的能力”。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工作者，笔者尽力做到对于艺术作品中作家或者艺术家“感兴趣的那些方面的能力”的发现，由此，发现作家的文学创作才华和其文学贡献或者局限，借以表达自己对于时代文化或者文学精神状况发展的认识，这便是本书的写作初衷。

杜威还说，“地方色彩是借以支付入场费的手段。揭去地方色彩，内在价值依然存在”。湖北地域文学不仅仅是一己的，而且是世界的。但前提必须是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学精神，才可能属于世界，并非越有地方特色，就越具有世界价值。否则，就是对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经典的误读。

笔者作为一个外省人，对于湖北文学的研究起于兴趣，终于自觉。如今在武汉生活已经整整五年，自然有与当地人不同的眼光，格外关注湖北文学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对公安派的研究是笔者在南京大学读古典文学硕士的毕业论文；而对池莉与新写实主义文学、以及对王晓英的研究则是湖北省教育厅的课题，对武侠文化和武当文化的关注则完全出于一种兴趣，当然也与笔者现在关注的大众文化问题有关。书中大多数文章曾经全文或者部分发表过。如今，作为“湖北文学专题论稿”加以系统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今天，文学尽管受到了现代影视传媒的深刻影响，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类型，其鲜活的精神气息依然会在文学这种古老的形式中出现，而且相比影视等影像大众文化，文学依然有自己的特殊审美韵味，不可能被完全取代，但本书还是将涉及的影视文化纳入了广义的文学范畴，这亦为时代发展应有之义。

这部书的写作历经了漫长的时间，但组织成稿则相对迅速，因为前期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这里为曾经在工作学习上提供过巨大帮助

的母校南京大学及硕士导师许结先生,以及复旦大学的博士导师部元宝先生,表示深深的谢意,没有他们当初的栽培是不可能这部书稿的。同时,也对武汉纺织大学的领导为本书提供学术出版基金的远见卓识,及武汉纺织大学那些友好帮助的同事们,不一一述及,一并感谢。是为序。

2013年8月26日

自序 / 1

第一章 袁宗道与公安派的兴起 / 1

第一节 袁宗道与公安派的兴起 / 1

第二节 袁宗道文艺观的心学基础 / 25

第三节 袁宗道文艺审美意识评述 / 35

第四节 袁宗道小品特征及地位略论 / 44

第二章 道文化、武侠与太极武当 / 55

第一节 武侠之道 / 57

第二节 武侠小说文类研究 / 77

第三节 武侠文化的艺术改造与提升 / 91

第四节 太极武当:作为武侠文化的象征符号 / 104

第三章 池莉与新写实主义研究 / 124

第一节 重释池莉《烦恼人生》的精神意蕴 / 124

第二节 私人经验与公共话语的纠结

——长篇小说《水与火的缠绵》《所以》合论 / 136

第三节 真实与矫情的文化悖论

——评池莉的散文创作 / 168

第四章 湖北网络文学研究 / 187

第一节 湖北现在网“长江杯”原创小说管窥

——兼论网络文学属性 / 187

第二节 深深的忧伤如雪花飞舞

——评王晓英的近期小说 / 199

第五章 湖北诗歌创作评论 / 212

第一节 生存困惑中的现代诗思

——论张执浩的诗歌创作 / 212

第二节 心灵的波动如何成为诗?

——论王晓英的诗歌创作 / 227

第三节 以诗人的名义与世界讲和

——再论王晓英的诗歌 / 239

第六章 他山之石:源远流长的古典诗学传统 / 252

第一节 论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性与诗学传统

——从李欣《宋南渡诗坛的格局与变迁》说开去 / 252

第二节 《葬花吟》的诗学承传与叙事映衬 / 259

第三节 《饮酒》组诗、玄风与艺术人生 / 270

后记 / 281

第一章 袁宗道与公安派的兴起

第一节 袁宗道与公安派的兴起

“公安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在晚明文坛的出现，其兴衰之骤令人惊奇。按一般文学史的说法，“公安派”指以湖北“公安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主要代表人物的一个文学流派，其他如雷思霈、陶望龄、江进之等也属于这个流派，但他们基本处于“公安三袁”的笼罩之下。另外，由于袁中道仕途的坎坷使其与两位兄长的活跃期有了一定的时间间距和内涵间距。因此，对“公安派”的兴起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就是袁宗道、袁宏道。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袁宏道已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而对袁宗道对公安派兴起的作用，则语焉未详。本章正着眼于此，力求有所辟发。

一、一个容易误导的结论

在历史上，一个流派的兴衰都与当时形势的整体运作态势密切相关，绝非单个人能独自创造历史；个别人物可能由于自身素质的原因，作出一些更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但也只有放到当时历史形势下对其考察才能作出大致准确的估价，否则，很容易夸大其词。袁宏道的名声在当时如此之盛，以致被认作新的“文坛盟主”，再加上

与被称作“两大教主”(达观与李贽)之一的李贽的特殊关系,便给我们造成了这种“英雄主义”印象,从而对“公安派”的阐释也容易导致一种误读。其始作俑者正是享有大名的钱谦益,他给袁中郎作了如下论断:

万历中年,王、李之学盛行,黄茅白苇,弥望皆是。文长、义仍,嶄然有异,沉痾滋蔓,未克芟荆。中郎以通明之资,学禅于李龙湖,读书论诗,横说竖说,心眼明而胆力放,于是乃昌言击排,大放厥辞……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濬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①

钱氏距中郎不远,且是中道的朋友,此论一出,影响甚大,后人论述中郎几乎无不以此作为参照。我们当然不是否定中郎的巨大革新作用,而是重新审视公安派兴起的具体历史要素,以便更清楚地找出当时可能的合理情况来。首先,我们把视线从文学移开,就学术思潮而言,晚明新潮革新派中人与心学或佛学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渊源。从王阳明创立心学起至中郎时代,单就左翼一脉,据黄卓越先生考察已经包含了五代人:“第一代即王阳明本人,第二代领袖为王畿、王艮,第三代为徐樾、王骥、王栋、颜钧、赵贞吉等,第四代为罗汝芳、耿定向、何心隐等,第五代为杨起元、周汝登、李贽、焦竑、管志道等。”^②而袁氏兄弟正是以李贽、焦竑为师的,特别是中郎被看作李卓吾的衣钵传人。正如黄卓越考察,晚明文界著名人物的关注点首要不是文学,而是性命心学,后代把他们列为文界只是分类学上的方

^①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袁稽勋宏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第567页。

^② 黄卓越:《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便,却极易造成一种误读。^①其次,在文界运动革新方面,迄中郎为止对复古派至少已有两次较大冲击。第一次以“嘉靖八子”特别是唐顺之、王慎中为启动,以茅坤、归有光为接继的首次冲击,即所谓“唐宋派”。第二次以徐渭、汤显祖为代表发动的向后七子复古派的第二次冲击。更为有意思的是,无论第一代成员还是第二代成员,均与心学领袖或佛教高僧有着密切的关系。^②再次,在政治上,中郎时代正是张居正政治改革失败,万历朝已经处于各派力量公开较量的时期,各种党派力量在朝廷较量的结果,造成了整个社会秩序趋向混乱,这种不幸却造成一个时期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第四,前后七子的文化霸权由于受到冲击而开始衰落,而新潮革新派亦处于一种暂时低谷状态,这种文学流派前后接替上的文化真空状态,给公安派的兴起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活动空间。如果我们以中郎发表《叙小修诗》(1596年)为公安派崛起的一个标志,那么,我们看看这一年以前当时文坛主要活动人物代表与生卒年限状况,便可发现这一人事变迁导致的文坛动向。

表 1-1 1596 年前后当时文坛主要活动人物状况一览

复古派代表			革新派代表		
姓名	生卒年限	籍贯	姓名	生卒年限	籍贯
李梦阳	1473-1530	甘肃庆阳	唐顺之	1507-1560	江苏武进
康海	1475-1540	陕西武功	王慎中	1509-1559	福建晋江
何景明	1483-1521	河南信阳	茅坤	1512-1601	浙江归安
徐祯卿	1479-1511	江苏吴县	归有光	1507-1571	江苏昆山
李攀龙	1514-1570	山东历城	杨慎	1488-1559	四川新都
谢榛	1495-1575	山东临清	李开先	1502-1568	山东章丘
王士贞	1526-1590	江苏太仓	徐渭	1521-1593	浙江山阴

① 黄卓越:《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东方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 页。

② 黄卓越:《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东方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 ~ 11 页。

续表

复古派代表			革新派代表		
姓名	生卒年限	籍贯	姓名	生卒年限	籍贯
王世懋	1536-1588	江苏太仓	汤显祖	1550-1616	江西临川
胡应麟	1551-1602	浙江兰溪			
屠隆	1542-1605	浙江鄞县			

当然对“公安三袁”有着直接影响的还有“江南四才子”如唐寅之流，他们那种恃才放浪的作风在早期袁中郎身上表现得极为明显。但我们应该看到一个文化流派得以形成并产生影响，不单需要一定的理论及文学成就，而且需要一种集团的力量来冲击与影响社会，而就他们的社会地位而言，都属于上层名流。例如前后七子，以及所谓后五子、广五子、末五子都是以上层文化官僚为核心形成的一种文化集团，“嘉靖八子”也全是当时第一流的进士出身，至于徐渭、汤显祖等第二代新派人物之所以遇到了巨大困难，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二是没有形成一种较大的集团力量；要是没有袁宏道，徐渭被终身埋没也未可知。而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公安派”的兴起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作为与心学和佛学有着密切关联的“公安派”作家，同他们的前辈革新派人物一样，是始终作为复古派的对立面出现的。至中郎时代，他们的前辈同复古派的较量至少已经四五十年了，所以，“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淪心灵、搜剔慧性”之论并不准确；而后世作为“公安派”标志的“性灵说”，据黄卓越的考察结果，这个学说一开始就与心学本体联系在一起，并与良知、灵知、灵明、灵性、真性、虚灵以及心源等概念组成了密集交叉的概念网络系统，而且与禅学修养功夫联系在一起。从心学到文学观念的借用，最初大规模的使用见之于徐渭、屠隆、王世懋、焦竑等，由对整个晚明思潮的仔细勘察可知，“性灵”概念并非袁宏道文艺思想的

主要标识,更非由其独创,也非由其致力阐释加以流行于世的概念。在此之前,大规模使用并于各个角度举其要意的是屠隆,并由此而对袁宏道等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在此之后,由袁宏道之弟袁中道对宏道的文学思想作了概括表述,进而才使“性灵”语汇逐渐成为人们对袁宏道思想的一种评估性概念,正式为世承认。

袁宏道正式登上文坛并扯起“性灵”大旗的标志,是公认的《叙小修诗》的发表,其文中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①这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发表的作品,虽然宏道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曾在赠其妻弟李子髯的诗中已经标明袁宏道单纯的“文士时代告别”,“如果说此前的袁宏道只会赋诗作文的话,那么从现在起,他又开始了品鹭往哲、议论时贤,既评说何(景明)、李(梦阳)的草昧创始之功及可师之处,同时亦不讳避其后学屈理修辞,模拟成弊的现实,可谓具体而微,语语中的”^②。但这时袁宏道才刚中进士,在家等候谒选,其所交知名朋友都是袁宗道的京师之友,他自己却还没有正式的社会地位,这也没有被时贤所共识的可能。而袁宗道《答陶石簒》信中说:“中郎极不满近时诸公诗,亦自有见。三四年前,太亟新刻至燕肆几成滞货……可见模拟文字,正如书画贋本,决难行世,正不待中郎之喃喃也。”^③又《大人书》云:“二哥(指中郎)……新刻大有意,但举世皆为格套所拘,而一人极力摆脱,能免末俗之讥乎?”^④这两信均作于1597年^⑤,可见当时复古派虽不受欢迎,

① 《袁宏道集笺校》卷4《叙小修诗》，钱伯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87页。

② 王承丹：《试论袁宏道前期的诗文理论》，《齐鲁学刊》1997年第6期，第94～100页。

③ 袁宗道：《白苏斋类集》，上海杂志公司1935年版，第206页。

④ 袁宗道：《白苏斋类集》，上海杂志公司1935年版，第190页。

⑤ 按《大人书》中言其女儿病歿；《答陶石簒》中言“中郎恰补得京兆授”，这两件事均发生于1597年。

却并未退场,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真正可以给予冲击的文学实绩创造出来;而中郎诗文迎来“末俗之讥”,亦说明二者的较量并未见胜负和取得世俗共认。“性灵”真正成为中郎作品的标志需要几个条件:(1)中郎作品创作实绩的展现;(2)中郎理论的梳理澄清与不断深化;(3)社会舆论在斗争中进行转向。而这几件事的完成至少要在1597年之后。据王承丹统计,万历二十二年至万历二十八年,是袁宏道创作全盛期的前期,占据了其创作总量的40%强,而万历二十四年到万历二十五年即1596—1597年属于袁氏创作的鼎盛期,其创作竟然占总量的20%强。^①而中郎理论的梳理、纠正与深化,更是在北京创建诗社之后的事情,这需要一个过程。中郎前期诗文理论明显以个体本位特征占据首要地位,诸如“性灵”、“心源”、“自适”均是与心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早期文风的那种华艳、明丽、智慧、诙谐而又放浪的风格特征,则与苏州地区的民俗风情密切相关。这里,我们重点看看其理论方面与前辈革新派之间的联系,就主要理论范畴方面作如下简明对照,我们借鉴一下陈书录先生的一个成果,见表1-2:

表 1-2 公安派与唐宋派部分理论范畴及术语对照表^②

唐宋派	关键词	公安派
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二,《荆川先生文集》卷七)	直抒胸臆	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叙小修诗》,《袁宏道集笺校》卷四) 信心而出,信口而谈。《袁宏道《张幼于》,《袁宏道集笺校》卷一一)

① 王承丹:《试论袁宏道前期的诗文理论》,《齐鲁学刊》,1997年第6期,第94~100页。

② 陈书录:《明代诗文的演变》,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6~367页。